

从清华简《封许之命》论西周初期分封^{〔*〕}

——兼议周公遮蔽下的成王封建

陈颖飞

(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,上海 200240)

〔摘要〕清华简《封许之命》带来的一系列新知:成王封许、始封君是吕丁、因功受封,纠正了许慎所言“甫侯所封”、杜预所指“武王封其苗裔”。杜预的武王说疑系误读《周本纪》武王封诸侯。《周本纪》为了展示周初的政治宏图,将武王、成王的分封揉合,一并归于武王。周初的分封,历武王、成王二代,在内外政治局势推动下而形成,并非断点式的一次或二次一蹴而就,有一个线性发展过程。可分为武王、周公摄政(成王前期)、成王亲政(成王后期)三个阶段。武王克商后,确曾褒封圣王后裔、封功臣谋士。成王前期,先封康,继而封齐鲁燕等重要封国,在立足西土的基础上,拓展对东土、北土的控制。成王后期,进一步加强了对北土、东土的控制,并大力经略南土,分封唐、邢、黎、韩、凡、蒋、茅、胙、祭,以及曾、鄂、厉、许、楚、邶、应等国,并徙封鄂等国。藉由不断发现的出土文献,周初封建的丰富性,尤其是周公高大光辉形象遮蔽下的成王封建,得以呈现。“成王靖四方”,系成王历前后两期封建四土的结果。

〔关键词〕《封许之命》;封建制;西周初期;成王;武王

DOI:10.3969/j.issn.1002-1698.2024.10.012

“封建亲戚,以藩屏周”的分封制在周初已建立,是西周^{〔1〕}最根本的政治制度,也是周王朝能延续数百载的重要原因。对于西周“封建”之功,传世文献记载不一,《左传》或归于周公,^{〔2〕}或并归于武王、成王,^{〔3〕}或并归于武王、成王、康王,^{〔4〕}或并归于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,^{〔5〕}《史记》则置于武王名下。出土文献有新说,清华简《系年》并归于成王、周公。^{〔6〕}记载不同,导致争论纷纭,具体到各国始封、徙封,意见则更为纷繁。^{〔7〕}

清华简《封许之命》是记载许国始封的册命,也是迄今唯一较完整记载西周初期册命诸侯国国君的简文,对于深入认识周初封建有重要意义。简文发表后,引发学界热烈讨论。封许的“王”是谁,系争论焦点问题之一,有武王、^{〔8〕}成王、^{〔9〕}周公^{〔10〕}三种观点。

封许的王是谁?为什么有武王、成王、周公之争?周初,即武成时期,西周分封是如何展开的?成

作者简介:陈颖飞,历史学博士,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,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”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外聘专家。

〔*〕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项目“出土文献与西周政治研究”(23&BZS003)的阶段性成果。

王时期的分封,历来的记载与研究,指向周公摄政的作为,故而归于周公,或成王、周公并举。成王亲政后的封建,以往重视不足,偶有学者提及,^[11]缺乏较系统讨论,近年,有的学者认为成王有二次东征而齐鲁燕等国始封于成王亲政后。^[12]这些问题仍需深入细致考辨。《封许之命》以及近出西周金文等,给我们一个契机,重新考察西周初期分封,尤其是成王时期的分封,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武王未封许国

据《封许之命》,许国始封君名为“吕丁”。他因何受封,究竟是褒封古国,还是新封功臣?考辨封许的王是谁等问题之前,需厘清这一问题。

许国始封君“吕丁”之名,是《封许之命》带来的新知识。整理者已精简考辨:

吕丁,吕氏,名丁,据简文为许国始封之君。

许慎《说文·叙》:“吕叔作藩,俾侯于许。”同书“鄆(许)”字下云:“炎帝太岳之胤,甫侯所封,在颍川。”甫即吕国。

《左传》隐公十一年《正义》引杜预云:“许,姜姓,与齐同祖,尧四岳伯夷之后也。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。”文叔,《汉书·地理志》颍川郡许县本注作“大叔”,简文“吕丁”当即其人,但据简文其受封实晚于武王时。^[13]

列明这位吕丁,传世文献作吕叔、甫侯、文叔、大叔,是“炎帝太岳”“尧四岳伯夷”的后代。

需要指出的是,整理者解说吕丁的这些材料,都出自汉以后文献,并无先秦记载。换言之,关于分封许国的具体记载,封赐王、受封人、分封时间等,都是汉以后的。这些记载源自何处?与先秦相关文献有何区别?仍需详加考辨。

吕氏封许,先秦文献缺载,但许氏族源有载,最早见于《左传》隐公十一年:“夫许,大岳之胤。”^[14]记许氏源自大岳。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二年又载:“姜,大岳之后也。”^[15]许、大岳、姜三者以大岳为结点关联。与吕氏的关系,《国语·周语》记其根源,大禹治水时共工“从孙”“四岳佐之”,因功:“祚四岳国,命以侯伯,赐姓曰‘姜’、氏曰‘有吕’”,^[16]直接系联四岳、姜姓、吕氏三者。《国语·晋语》另记姜姓源于炎帝:“昔少典娶于有蟠氏,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以姬水成,炎帝以姜水成。成而异德,故黄帝为姬,炎帝为姜。”^[17]结合《左传》与《国语》的四条材料,许氏、大岳(四岳)、姜姓、吕氏、炎帝五者可相联系,而许氏为姜姓、吕氏,炎帝与大岳(四岳)之后,系时人乃至后人的共识。

东汉许慎谈“许”,秉承了这些先秦以来的共识。《说文》“许”字下记“炎帝太岳之胤”、《叙》中追述祖先将吕与许结合,皆系先秦旧识。
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知。许慎新增三点,皆与许国分封相关:第一,始封君排行为“叔”,即“吕叔作藩,俾侯于许”。第二,与“甫”结合,称“甫侯所封”。第三,封地“在颍川”。

第一、三两条可呼应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颍川郡”许县下附注:“故国,姜姓,四岳后,太叔所封,二十四世为楚所灭。”^[18]许慎或取自此说,也不排除有其他来源,或共同的更早记载的可能。需要注意的是,班固和许慎都未记分封时间,仅有“二十四世”之说。从这个数字来看,西周初年所封最合适。如同样为楚所灭的蔡,武王所封,二十五世而亡。这两条材料,虽尚未发现先秦的记载,但学界并无异议,可以信从。

第二条“甫侯所封”,不能成立,清段玉裁等已有论断。^[19]清华简整理者解说“甫即吕国”,是正确的。问题是,许并不能等同于甫。^[20]段玉裁认为,许慎是以穆王时期作《吕刑》的甫侯为许国始封君,并取杜预的说法相驳斥,“武王既封文叔于许矣,岂待穆王封甫侯于许”,“然则封许者文叔,非甫侯

也”。他的有力证据之一是“《诗·王风》申甫许三国并言”。^[21]可以补充的是,另有两条材料申吕齐许四国并称,可相呼应。皆见于《国语·周语》,“申吕虽衰,齐许犹在”“齐许申吕由大姜”,前者孔颖达正义《吕刑》已引,论定“吕即甫也”。^[22]对比申甫许三国、申吕齐许四国并称,不仅可辅证“甫”即“吕”,更由“甫许”“吕许”皆可并立,确知许国并非吕国、甫国,许国始封君当然不可能是“甫侯”或“吕侯”。

段玉裁主张许不是甫,确可信从,但他所据的杜预新说“武王既封文叔于许”并不可信。

杜预解说“许”,与许慎同样,既有先秦旧知,也有新的信息。“许,姜姓,与齐同祖,尧四岳伯夷之后也”,系前者。与许慎不同的是,杜预这一记载,不仅以上述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四条材料的结合为基础,还糅合《书·尧典》记尧与四岳、伯夷关系的内容。“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”,则是后者,也是最早记载武王封许的材料。其中,“叔”这一排行,上文已述,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说文·叙》已记,分别为“太叔”“吕叔”。文为谥号、太(即大)是排行、吕系氏名,一人三称。

与以往文献相比,杜预这条材料,最重要的是武王封许,系武王说的最早来源,疑受《周本纪》影响推测而来。唐孔颖达《左传正义》引魏晋杜预注“许”,出自杜预《春秋释例·世族谱》。孔颖达曰:“杜君采《太史公书》、《世本》,旁引传记,以为《世族谱》”。今本《世本》许氏条曰:“周文王封其太岳裔孙文叔于许”,^[23]持文王封许说,与其他各说皆不同。故而杜预并未采用此说,而改用武王封许。但后说源自其误读《周本纪》。

《周本纪》记武王灭殷后有一次大分封:

武王追思先圣王,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,黄帝之后于祝,帝尧之后于蓟,帝舜之后于陈,大禹之后于杞。于是封功臣谋士,而师尚父为首封。封尚父于营丘,曰齐。封弟周公旦于曲阜,曰鲁。封召公奭于燕。封弟叔鲜于管,弟叔度于蔡。余各以次受封。^[24]

这次“封诸侯”,有两类人:一是“先圣王后裔”,系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的后代;一是“功臣谋士”,有齐、鲁、燕、管、蔡。“许”皆不在两类之内。但《周本纪》又说“余各以次受封”,表明这两类所列仅是举要。疑杜预推测“许”为“余”中之一,据此论定许国为武王所封。结合此注前文是“尧四岳伯夷之后也”,又强调“封其苗裔”,或杜预将封许归为第一类,即褒封“先圣王后裔”。受此影响,宋刘恕便直接说:“周武王封文叔于许,以奉大岳之祀”。^[25]

《封许之命》,不仅纠正了武王封许说,而且证实许国受封的原因,并非因“苗裔”得封,而是因功受封,始封君“吕丁”历文武成三代,是周初重要的“功臣谋士”之一。

作为封建诸侯的册命,《封许之命》夸赞了受封者吕丁的功劳,然后“命女(汝)侯于许”等等。尽管缺失了第一简,简文仍明确记载吕丁的功绩主要是历文王、武王两王而累积:

……越在天下,故天劝之乍〈亡〉敦,向振厥德,膺受大命,骏尹四方。则惟汝吕丁,肇佑文王,愆光厥烈。

[武王]嗣明刑,厘厥猷,祇事上帝,桓桓丕敬,严将天命。亦惟汝吕丁,扞辅武王,干敦殷受,咸成商邑。

□□余小子,余惟纘文王明刑,非敢荒怠,畏天之非忱,册羞折人,审民之若否。今朕永念乃勋,命汝侯于许。汝惟壮耆尔猷,虔恤王家,简义四方不翊,以勤余一人。……^[26]

吕丁辅佐文王、武王,取得了一系列功绩,其中包括伐商纣、取商邑等,因而受封许国国君。第四简发现前,整理者已指出,简文中的“文王”“武王”应是谥称,封吕丁的周王是成王。^[27]新增第四简后,封许的这位王是成王,更为彰显。贾连翔的补充释文已有述。^[28]可以补充两点:首先,从结构而言,这段简

文可分为三个层次,述“文王”“武王”“余”三个时期王的功绩,以及“汝”(吕丁)相应的辅佐之功劳;其次,从文字而言,“(武王)嗣明刑”与“余惟纆文王明刑”相呼应,已述武王继承“明刑”,“余”不可能再重复为武王,应是成王。

同为姜姓吕氏,皆历文武成三王,都因功绩受封,吕丁与齐太公吕尚(太公望、师尚父、吕上父)有何关系?有的学者认为与齐太公吕尚(太公望、师尚父、吕上父)有关,是其子吕伋,^[29]有的学者把他和文献记载周初的另一吕氏人物联系,认为是《逸周书·世俘》所记吕他。^[30]

“吕伋说”不能成立。吕尚的儿子吕伋,见于《书·顾命》《左传》:

太保命仲桓、南宮毛倬爰齐侯吕伋。^[31](《顾命》)

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、王孙牟、燮父、禽父并事康王。^[32](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)

后一条,《楚世家》改“康王”为“成王”:

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、卫康叔子牟、晋侯燮、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。^[33]

成王临终顾命时,吕伋在列,历成、康二朝。^[34]《史记·齐世家》载“丁公吕伋”,这位吕伋称“丁公”。虽与吕丁都有“丁”之名称,但不可能是同一人。吕伋是齐国第一代国君,吕丁是许国始封之君,齐在营丘,许居颍川,两国长期同时存在,既不可能一国两名,也不可能是徙封,始封君并非同一人,但都是成王所封。

吕丁也并非齐太公吕尚其他子辈。据《封许之命》简文,许国始封君吕丁在文王时期就有很多功绩,又历武王、成王,若是吕尚的子辈,资质不够。

吕丁不是吕尚子辈,从简文未提及吕尚,还可为辅证。按照西周册命体例,夸耀祖考,是重要的一部分。以《书·文侯之命》为例。平王册命晋文侯,首先夸赞祖先,从文王讲起,说到自己“予小子”,然后再讲文侯,“汝克昭乃显祖”“追孝于前文人”等等,都是让他向祖先学习。作为一篇较完整的册命简文,没有与祖考相关的这类话语,说明不是袭封,既非袭太岳,也非袭吕尚。否则,简文里不可能不夸耀一番。

“吕他说”或有可能。参加武王伐商的吕氏,除吕尚(太公望)外,文献仅载吕他一人,且仅一见。《逸周书·世俘》记武王灭商纣后,命太公望、吕他等继续征伐不肯顺服周的殷商残余势力:

太公望命御方来。丁卯,望至,告以馘、俘。

……

吕他命伐越戏方。壬申,荒新至,告以馘、俘。^[35]

杨宽认为,吕他等六名将领“都是师氏之职,就是当时周的六师的长官”。^[36]作为重要的将领之一,吕他在武王伐商时建立功绩,与《封许之命》述吕丁“干敦殷受,咸成商邑”一致。鹏宇已从吕丁与吕他都在武王伐纣期间立有战功,“颇疑吕丁、吕他为一入异称”。^[37]王宁则指出,古字的“叔”(弔)和“他”(佗)形近易讹,《逸周书》错讹很多,《世俘》“吕他”应系“吕叔”的讹写。^[38]不论文献中的“吕他”,究竟是“吕丁”还是“吕叔”之讹,但从经历、字形这两方面看,吕他确有可能是吕丁。

综上,作为迄今唯一记载许国分封的先秦文献,《封许之命》带来的一系列新知:成王封许,始封君是吕丁,他是因功受封,纠正了许慎所言“甫侯所封”、杜预所指“武王封其苗裔”。许慎、杜预解说“许”,可分为糅合先秦旧说、受到汉以来文献影响、推演新见三部分,而后者往往致误。许慎的“甫侯所封”受《吕刑》又作《甫刑》等的影响而混淆甫许,杜预的武王说疑系误读《周本纪》武王封诸侯而来。吕丁与太公望同姓同氏,即同祖同源,但并非太公望儿子吕伋或其他子辈,疑确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系《世俘》所记吕他。吕丁封许,既彰显成王时期姜吕集团仍是最重要的异姓支持者,也表明这一时期

姜吕集团在齐国之外仍具备强大力量。

二、西周初期的分封：武王与成王之争

封许的“王”，究竟是成王，还是武王，不仅关乎许国的始封，更涉及对周初封建的整体认识，也与齐鲁燕等重要封国的始封有关。

齐鲁燕等国的分封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有不同记载。

武王封建说见于《周本纪》，上节已引。武王伐商胜利后，分封诸侯，有“先圣王后裔”“功臣谋士”两类。前者还见于《史记》的另一篇：《乐书》。与《周本纪》相比，个别文字稍异，时间细分“未及下车”及“下车”，诸侯缺神农之后而增殷之后。《乐书》完全抄自《礼记·乐记》。另见于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。《乐记》、^[39]《吕氏春秋》皆先秦文献。可见，武王封“先圣王”后裔的说法，太史公时期已有两个以上不同传本，渊源有自，先秦时期已存在。后者，即封“功臣谋士”，有两点需要注意。一是受封的系“功臣谋士”，即师尚父和周公等群叔。一是各封国都远离王畿，以所列齐、鲁、燕、管、蔡而言，管离王畿最近，邻近后来营建的洛邑即“中国”（何尊铭），但就王畿而言，仍系东土，齐、鲁也为东土，蔡为南土，燕为北土，加上王畿所处西土，四土具备，周王朝当时对“天下”的宏大谋略可见一斑。这应是《周本纪》明列这数国的原因。

《周本纪》武王封建说渊源有自，除部分见于《乐记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先秦文献外，另可呼应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八年的记载：“昔武王克商，光有天下，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，姬姓之国者四十人。”^[40]这条材料，虽未如《周本纪》那样明确说武王封了哪些诸侯，但将封建归于武王。

与武王封建说不同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则记成王封齐：“周成王时，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，成王灭之，以封师尚父。”^[41]“薄姑”，见墜方鼎（《集成》2739）铭，对照此铭“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薄姑”，可知“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”就是史称周公东征三年的第三阶段，这场战争，或称为“伐东夷”“践奄”。《逸周书·作雒》所称征伐“十有七国”，^[42]虽未明列具体各国，但奄、薄姑都在其中，齐系薄姑氏旧土，《地理志》此处述封齐，便强调“薄姑氏”。奄、薄姑都是先归后叛，《左传》昭公九年：“及武王克商，蒲姑、商奄，吾东土也。”^[43]近年周公庙发现“薄姑”卜辞：“王其呼仆口，薄姑来使，于复薄姑，斯亡咎”，记薄姑与周使臣往来，李学勤认为时间“最可能是在武王伐商的过程之间”。^[44]为薄姑系归顺后的叛乱，提供新证。战后，成王对待薄姑与奄略有不同，两国国君前杀后迁。上引“灭之”，“之”指薄姑，“灭”，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三年杜预注：“国虽存，君死，曰‘灭’”。^[45]《书序》“迁其君于蒲姑”、^[46]《周本纪》“迁其君薄姑”，^[47]皆记将奄国国君迁到薄姑。薄姑、奄两地，分别封给师尚父（齐太公）、周公。从薄姑与周关系的整个发展过程看，武王封齐鲁说确实难以成立。武王伐商时，已与薄姑往来，武王灭商后，薄姑顺势倒向周，既然已经归顺，如何能够封齐？唐兰先生已指出，“成王没有践奄，如何能封周公于鲁，武王根本没有讨伐到殷以北，如何能封召公于燕”，他认为齐鲁燕三国“都是周公东征以后才封的”。^[48]至确。灭薄姑才能封齐，“践奄”才能封鲁。齐鲁相邻，“践奄”与灭薄姑密切相连，系三年东征的最后阶段，封齐鲁系其结果，在同一时期稍后，即东征三年胜利不久。

《诗经·閟宫》明确记载成王封鲁：

王曰叔父，建尔元子，俾侯于鲁……

乃命鲁公，俾侯于东……^[49]

“王曰叔父”，系成王对周公说。“建”，即封建。“元子”“侯于鲁”，故后文又称“鲁公”。

成王封鲁，又见于《左传》定公四年，且记封康、唐：

昔武王克商,成王定之,选建明德,以藩屏周。故周公相王室,以尹天下,于周为睦。
分鲁公……以法则周公,用即命于周……因商奄之民,命以《伯禽》而封于少皞之虚。
分康叔……命以《康诰》而封于殷虚。皆启以商政,疆以周索。
分唐叔……命以《唐诰》而封于夏虚,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。^[50]

根据这条材料,“以藩屏周”的是周成王,鲁康唐三国皆其所封。仅记此三国,是由于分别封在“少皞之虚”“殷虚”“夏虚”,需用周政(“以法则周公”“用即命于周”)、商政(“启以商政,疆以周索”)、夏政(“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”)这三代之政治民。并非实录同时或同一次分封。封此三国的册命《伯禽》《康诰》《唐诰》,仅《康诰》传世,其余两篇皆佚失。

封康叔,最完整的记载是《康诰》。此篇的时代,宋以来多有争议。^[51]封康时间、康卫关系,俨然成谜。沫司徒疑簋(《集成》4059)^[52]和《系年》等出土文献也有封康叔的记载。《系年》发表后,李学勤对读二者,解开此谜。《系年》记卫国的初封与迁徙:

周成王、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,乃追念夏商之亡由,旁设出宗子,以作周厚屏,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,以侯殷之余民。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。^[53]

李学勤指出,“康丘”“淇卫”都“属于卫的一部分”,“叔封封为诸侯只有成王时一次,武王时封康一说是 不符史实的。”^[54]

封康的时间,具体是哪一年?有的学者据《尚书大传》“四年建侯卫”,认为是周公摄政的第四年。^[55]但此说与《康诰》《系年》、沫司徒疑簋等记封康的文献有矛盾,仍有讨论的必要。

《康诰》与《系年》都以封康在作洛邑之后,这与《尚书大传》“四年建侯卫”“五年营成周”恰相反。

《康诰》开篇曰:“惟三月哉生魄,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,四方民大和会,侯甸男邦采卫、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,周公咸勤,乃洪大诰治”,以“作新大邑于东国洛,四方民大和会”在封康之前。但这开篇四十八字,历来有疑,应系他篇混入。^[56]《书序》:“成王既伐管叔、蔡叔,以殷余民封康叔”则是可信的。上引《系年》:成王、周公“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,以侯殷之余民”不误,但置封康于“既迁殷民于洛邑”之后则不妥当。

沫司徒疑簋铭,可以提供新信息。铭文开篇:“王来伐商邑,征(诞)令康侯鄙于卫。”有徙封、始封两说。^[57]后说可从。“王来伐商邑”,即大保簋(《集成》4140)“王伐录子耶”、卿盘(《铭图》14432)“周公来伐商”。“来伐”在“克殷”之前,“来”是开始,“克”是结果。“来伐商邑”应系东征三年的第一阶段,即《尚书大传》“一年救乱”。卫,是殷墟所在,也是三监、武庚之乱的发生地,即《康诰》所言“肆汝小子勗封,在兹东土”之“东土”。铭文“诞令康侯鄙于卫”,^[58]紧随“王来伐商邑”,两者相隔的时间不会太长。救乱、克殷后,立即要稳定殷墟,成王很快便将康叔封在卫,这是合理的。东征三年乃至其后,康叔系最早分封,便是这个原因。《系年》称“先建”,与此一致。从这一点看,封康叔,至迟应随着“二年克商”而实行,不太可能晚于“三年践奄”。若是已经践奄,那么“四年”封建时,齐鲁等国当一并分封,但这与疑簋铭文、《系年》“先建”不合。《尚书大传》“四年建侯卫”恐并非实录,疑封康时间在克商后践奄前的这段时间,即周公东征的过程中,而并非东征三年之后。

燕国疑与齐鲁同期所封。1986年,北京琉璃河大墓出土克盃、克罍两器,^[59]铭文记封燕:

王曰:“太保,惟乃明乃心,享于乃辟。余大对乃享,命克侯于燕……”

“王”系成王,由于太保(召公)的功绩,成王将克封在燕。封燕是为了屏卫北土,抗击山戎。封燕的具体时间,疑与封齐鲁相近或同时。齐太公、周公、召公是周初地位最高的三位大臣。封其子为诸侯,实

质是对三公的再封。齐太公是伐纣的首功。周公、召公是东征的首功、次功。封诸侯,疑召公不能居周公之前,但也不会太靠后。不排除齐鲁燕三国是同一时期所封的可能。

上述康、齐、鲁、燕四国并非是一批,仍有次第,不能简单地把成王时期的分封仅看作一次大分封。

康、齐、鲁、燕四国之封皆由于周公东征,在周公摄政期间,传世文献或将其作为周公所封,《荀子·儒效》载:

武王崩,成王幼,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,履天子之籍……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,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;周之子孙,苟不狂惑者,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。^[60]

彰显周公封建之功。对比上引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八年记武王克商后,“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,姬姓之国者四十人”,到周公摄政结束,封国总数增加了十六国,其中姬姓有十三国,而异姓仅三国。

《史记·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》则加上康王:“武王、成、康所封数百,而同姓五十五。”^[61]“数百”或有夸大,但加上康王,姬姓封国比《儒效》所述“周公屏成王”时仅多二国。这个数字并不可靠。但以康王也有封建,先秦文献中有源头,应是受此影响。

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曰:

昔武王克殷,成王靖四方,康王息民,并建母弟,以藩屏周。^[62]

需要注意的是,武王、成王、康王皆对西周分封有建树。康王对分封的贡献,与史墙盘(《集成》10175)铭述康王“分尹亿疆”的功绩一致,学者已有论证。^[63]此外,《左传》昭公九年曰:“文武成康之建母弟,以藩屏周”,^[64]将文王也列入封建的范围。文王尚未克商,康王处于西周早期中段,都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周初,另文撰述。但这给我们一个证据,西周分封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,恐不能仅仅归于一人或一次、二次,也并非一蹴而就。具体到周初,即武成时期,也是如此。

简之,周初分封应看成是一个发展过程,才能理解武王说、成王说的冲突。《周本纪》在糅合史料的过程中,为了展示周初的政治宏图,将武王、成王时期分封的材料揉在一起,归于武王,以致争论产生。武王克商后,确曾褒封圣王后裔,也曾封功臣谋士。成王即位后,三年东征期间封康叔建卫,东征胜利不久封齐鲁燕,并非一次封建,而封康的时间也并非《尚书大传》所记“四年建侯卫”。康齐鲁燕系周初最重要的一些封国,因处周公摄政七年间,文献对此或记为周公,或记为成王,或并记成王、周公。

三、出土文献所见成王后期的分封

上节所引记周初封国数目的三条材料如果都成立,武王封国数量最多,计五十五国,其中姬姓四十国,周公摄政期间(成王前期)其次,增加十六国,其中姬姓十三国,成王后期与康王时期增加的姬姓国仅二国。正是由于比较以上这些材料,学界多认为周初的封建,主要完成于武王、周公摄政(成王前期)时期,成王亲政后(成王后期)的分封未受到充分讨论与重视。

《左传》定公四年所记封鲁、康、唐三国,前两者上节已述,系周公摄政期间所封,后者则需重新考辨。

封唐,是武王还是成王?唐叔虞是武王子还是武王弟?晋公盂(《集成》10342)发现前,并无异说。传世文献皆载唐叔系武王子,成王所封。最早出自《左传》昭公元年的记载:武王妻子邑姜生唐叔前,梦见天帝对她说,“命而子曰虞,将与之唐”,到了成王时期,“成王灭唐而封大叔”。^[65]与上引《左传》定公四年记成王封唐一致。^[66]晋公盂发现后,武王灭唐说流行,争论不一。^[67]

近年新出晋公盘(《铭图》续952),与早出的晋公盂内容相同,但残损较少而文字更完整,两铭追述“皇祖唐公”的功绩:

我皇祖唐公，膺受大命，左右武王，教威百蛮，广辟四方，至于不廷，莫(不)秉明。王命唐公，建宅京师，君百姓作邦。^[68]

“唐公”即唐叔虞。“左右武王”、武王命其“建宅京师”，系武王封唐说的主要证据。李学勤已指出，“京师”系周都镐京，武王命唐叔虞“宅于镐京，事在封唐以前，也与分封无涉”。^[69]我们倾向此说。东征三年的第三年，成王亲自到过奄，此时并非幼年。^[70]唐叔是“大叔”，即成王最大的弟弟，即便是周公摄政初年，年纪也不可能太小。晋公盘铭唐叔曾“左右武王”，恰恰证明成王即位之初已经不太小。简本与传世本《金縢》“王与大夫尽弁”，记成王已冠，李学勤据此推断成王“即位时年纪也不很小”，古人推断的十三岁之说是合理的。^[71]铭文中的“唐公”系追述的称呼。“教威百蛮，广辟四方”等语，或有夸张，也可能是应合他后来得以封唐，但也显示唐叔虞的两个功绩：一是控制威慑其他族群，一是开疆拓土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：“昔武王克商，通道于九夷百蛮”，^[72]与此可相呼应。对其他族群的防御、征伐、控制，是封建最主要的一个因素。周宣王封韩侯，《诗·韩奕》也记曰：“以先祖受命，因时百蛮”，这里的“百蛮”主要针对的也是北方戎人，但系山戎。

近出周公庙卜辞，为成王封唐提供新材料。卜辞曰：“公才口师，令士众卜曰：唐人其于先，师于丰，由亡咎。”有学者指出，公即周公，此系周公灭唐一事。^[73]可信。这与《史记·晋世家》“成王立，唐有乱，周公诛灭唐”^[74]一致。有的学者将灭唐时间归为周公辅政时期，认为“成王灭唐”是记“时”，“周公灭唐”系道“实”。^[75]笔者同意此说。今本《竹书纪年》记灭唐时间是成王“八年”，并记成王“十年”“命唐叔虞为侯”。^[76]以封唐为成王亲政后，这是有可能的，但所记王年，并不可信。

唐迁于晋的时间，见于近年新发现的疏公簋(《铭图》4954)铭：“疏^[77]公作妻姚簋，遣于王命唐伯侯于晋，唯王廿又八祀。”明确记载唐国迁到晋的王年是“二十八祀”。有成王、康王两说。^[78]晋侯墓地发现9组墓，时代最早的就是晋侯燹父的，墓主就是这位“唐伯”，也是第一代晋侯。唐叔虞本人墓地应在唐，仍未发现。

为什么成王灭唐？为什么又从唐迁晋？商末，唐是周的盟国，晋侯墓地出土文王玉环(《铭图》19710)铭：“文王卜曰：我累唐人，弘践崇人”，记载文王联合唐征伐崇。^[79]崇是商纣的支持者，唐伐崇，便也是反商，无疑与东征所征商奄等商的残余势力不同。那么，成王时期，曾是盟国的唐国为什么成为敌对国？从唐国地望，或可推测。古唐国的位置，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记载不同，《晋世家》曰“唐在河、汾之东，方百里”，《汉志》载：“晋阳(今太原)故《诗》唐国。”晋侯墓地发现后，邹衡认为“天马——曲村遗址应该就是唐叔虞始封之地；在周初，此地应该名唐”。^[80]李学勤据文王玉环铭，也认为晋阳说不能成立，应取《晋世家》的说法。唐所封区域，系夏墟所在，周边杂居戎人。封唐，令唐叔虞“启以夏政，疆以戎索”，就是要求唐叔以夏人、戎人的政治和风俗统治唐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西周早期铭文中有所谓邢侯伐戎的信息。臣谏簋铭记邢侯与戎人作战，李学勤指出臣谏簋系成王时器，此铭的戎人，便是北戎从山西境内南下到河北。^[81]这给我们一个启发，成王时期，唐国的动乱，很可能有戎人因素。这支戎人，就是散居在今山西境内的北戎。无疑，成王时期，北戎已是一个重要威胁。唐国夏戎杂处，疑唐国动乱有戎乱的因素。从唐迁到晋，很可能与抵御北戎的形势变化有关。

成王灭唐在即位后的哪个阶段？考虑到东征三年，主要征伐的是商纣残余势力的东土诸国，而唐国与商纣敌对，应不在征伐之列。唐之乱，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。成王亲政后，分封群弟，唐叔作为同母最长的弟弟，首当其先。从这推测，叔虞封唐应在成王八年即亲政后。

成王封诸侯，见于出土文献的另有邢、軫、黎、曾、鄂、厉等国。可分两类，邢、軫、黎系北土，曾、鄂、厉在南土。

邢国的分封,见于麦尊(《集成》6015)、邢侯簋(《集成》4241)等铭。但周初邢是否徙封?由于对麦尊、邢侯簋理解不同,争议较大。^[82]两铭开篇曰:

王命辟邢侯出勅,侯于邢。(麦尊)

惟三月,王命荣冢内史曰:“鬻邢侯服,赐臣三品:州人、重人、郭人。”(邢侯簋)

李学勤正确指出,麦尊记邢的始封,“是在成王后期,周公已逝之后”,邢侯簋则是再封“邢侯为王官”的册命,“年代应略晚于麦尊,可以估定在成康之际”,实质上否定周初邢国徙封。他还强调封邢有两大意义:抵御北戎、作为燕卫间枢纽。^[83]可以补充的是,从邢侯出身看,这些论断是合适的。邢侯是周公的儿子,受封时间必定比封鲁的“元子伯禽”、封燕的召公奭子晚,也应该比作为“大叔”的唐叔晚,周公逝后最是恰当。

与邢相关,有一个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封国:軹国。1978年河北元氏县西张村出土一组器物^[84],其中叔趯父卣(《集成》4237)铭:“汝其用饗乃辟軹侯逆出内使人”称“軹侯”,无疑“軹”是封国。同出有臣谏簋(《集成》4237),铭文开篇:“惟戎大出(于)軹,邢侯搏戎。”李学勤已指出,叔趯父、臣谏是同一人。臣谏簋“作于谏受命处軹的时候”,是成康之际制作的器物,“尊、卣则作于他的暮年”,“应定为康王时(甚至更晚一些)”。^[85]无疑,至迟成康时期,邢国附近已另封有軹国。臣谏簋所记,这位与戎大战的邢侯,系麦尊、邢侯簋“邢侯”,即邢国始封君。軹侯出身不可考。但从这些铭文看,封軹也有抗击北戎的作用。

除邢、軹外,黎也是西周金文中明确记载抗击北戎的封国,蕃簋(《铭图》5179)铭:

馭戎大出于楷,蕃搏戎,执讯获馘。楷侯厘蕃马四匹……^[86]

楷,即清华简《耆夜》简所戡“耆”、《书·西伯戡黎》作“黎”。楷侯,即黎侯。成康时器献簋铭有“楷伯”“在毕公家”。2006年山西黎城西周黎国墓地发现,出土楷侯壶、鼎,器主为“楷侯宰”。^[87]结合这些材料可知,黎原系商的封国,支持商纣,商末时为毕公高所灭,因而分封时黎封给了毕公高,献簋的“楷伯”即第一代黎侯,系毕公高的儿子。^[88]黎国始封,究竟在什么时候?结合分封齐鲁燕之封,从身份而言,当在其后。封黎是为了抗击北戎,与唐、邢、軹等相呼应。

成王后期,随着东土的平定,北土中的山戎也有屏障,与北戎的关系上升到重要位置,系这一时期最重要对外事务之一,疑唐、邢、黎等国的封建,就是为了针对北戎。

封曾,见于近年新见曾侯与钟(《铭图》续1029)、嬭加钟(《铭图》三1282)、曾公求钟,铭:

王遣命南公,营宅汭土,君庇淮夷,临有江夏。^[89](曾侯与钟)

伯括受命,帅禹之堵,有此南涯。^[90](嬭加钟)

皇祖建于南土,蔽蔡南门。慎应京社,适于汉东。南方无疆,涉征淮夷,至于繁阳。^[91](曾公求钟)

皆记曾国始建。“南公”“伯括”系一人,即史籍所见文武时期的重臣“南宫括”。“王”应是成王。曾国在成王时期便在湖北随州地区建立,系姬姓。曾国始封君,正如鲁国等一样,应系南宫括的嫡长子。

封鄂,新见疑尊(《铭图》续792)、疑卣(《铭图》续881)有信息,铭文开篇曰:“惟仲义父于卜鄂侯于盩城。”李学勤指出,“是仲义父去为鄂侯占卜建都之事”,认为“这有可能就是周代鄂侯的始封”,而疑器的时代应属于成王亲政后。^[92]换言之,封鄂应在成王后期。鄂,姑姓。商纣时,鄂侯位列三公,被纣所杀。传世文献中,鄂国的记载极少。西周鄂国南迁的时间、地望,以往并不清楚。2007年随州羊子山西周早期鄂国墓地发现,出土一系列青铜器,其中有“鄂侯”等铭,确证周初鄂国已迁徙到随州。

M4 的墓主是一代鄂侯,下葬年代约为康王早期,应活跃于成康时期。或系迁封到此的西周始封鄂侯,即疑器铭文的“鄂侯”。

封厉,见于太保玉戈(《铭图》19746),铭曰:“六月丙寅,王在丰,令太保省南国,帅汉,遂殷南,令厉侯辟,用鬻走百人。”李学勤已指出,这是西周厉侯的始封。^[93]“王”系成王。铭文可分两个时间段,先是“太保”召公奭受成王命,沿着汉水南下,省察南土,继而南土诸侯来殷见成王,封厉正是后一时间段。厉的地望和族氏,徐少华已指出,在“随州东北百里殷店一带”,系“南方古族厉山氏之后”。^[94]

曾、鄂、厉皆在随州地区,都是成王所封,上文已述鄂封于成王后期,疑封曾、厉的时间也相近,皆在成王亲政后。曾、鄂、厉都分封在随州地区,可类比齐鲁封于奄、薄姑,属于同一时期的邻近性分封,都有极强的针对性,很可能有消灭或抵挡一些潜在威胁的考量。成王前期,即周公摄政七年,围绕东征、营洛二事,主要是平定和巩固对东土的控制。东征胜利后,原居东土的一些反周势力南下,并逐渐立足南土。随州所在江汉平原这一带,便是关键通道。成王亲政后,经略南土便以此为中心。

成王后期封建南土诸侯,许国也在列。《封许之命》整理者已指出,许国受封时间,“更可能是在成王亲政后不久的时候”。^[95]

成王分封的诸侯,明确记载的还有楚国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熊绎当周成王之时,……而封熊绎于楚蛮,封以子男之田,姓芈氏,居丹阳。”^[96]不排除与封曾、鄂时间大略相当。

简之,成王亲政后的封建,传世文献较少记载,勾勒系联出土文献,可显露这一部分史实。“成王靖四方”并非虚言,也并非仅指周公摄政期间的征伐东土,也有亲政后的平定北土、南土。唐、邢、軫、黎,乃至唐迁晋,皆系为了控制北土。曾、鄂、厉、许、楚等国的分封,则系经略南土。

四、结 语

武王、成王两代封了哪些诸侯,文献未能尽载,但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富辰的话是一个重要信息:

管、蔡、邶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郟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丰、郟,文之昭也。

邶、晋、应、韩,武之穆也。

凡、蒋、邢、茅、胙、祭,周公之胤也。^[97]

其中,“鲁”指周公,“周公之胤”便不再列“鲁”。据这条材料,结合武成两代政治局势,或可作些推测。

第一,文王的儿子,计 16 位,分封疑至少有前后两批,分别为武王、周公摄政期间(成王前期)所封。前者系管、蔡、霍三叔,较年长,是武王灭商后随即在东土设立的三监,应系武王所封。后者又可分两类,邶、郟、曹、滕皆在宋鲁之间,疑东征三年后不久封国,很可能封在齐鲁稍后,或同一批次。毛、聃、雍、原、毕、丰、郟,考虑到从排行而言居鲁卫之后,不可能早到武王时期,应晚于东征后,而作为武王弟、成王王叔,不太可能晚于成王亲政时期,疑为周公摄政期间所封。周公分封群弟,既是为了“以藩屏周”,也是当时政治局势的需要。周公摄政,引发周王室内部的不满,尤其是群叔,管蔡之乱便有这一因素,为了稳定朝局,周公分封群弟,以作安抚。

第二,武王的儿子,计 4 位,皆成王亲政后所封。晋即唐,始封君叔虞是成王母弟,也是最大的弟弟,尚且成王亲政才封国,邶、应、韩当封在其后,疑封于成王八年之后。

第三,周公的儿子,计 6 位,也是成王亲政后所封。周公摄政,本就需要安抚召公及诸弟的不满,当然不太可能广封自己的儿子。成王亲政后则不然,为了安抚周公遗留的势力,恰恰有广封周公诸子的需要。上文已述,邢国的分封便在其亲政后。其他五国凡、蒋、茅、胙、祭,应皆系成王亲政后所封,不排除同一次分封的可能。徐少华指出,“五国都在东都以东的黄河两岸要地,以控制殷商移民、拱卫

东都王室”。^[98]至确。成王后期,对于东土,进一步加强控制,周公五子封建,便是重要方略之一。

以上二十六位,并非文王、武王、周公全部享有封国的儿子。加上周公的儿子鲁侯,至少有二十七位。

另有一些姬姓诸侯,可明确断定受封的时期。文王弟,如二虢,应系武王所封。召公,也是武王所封。

总之,周初的分封,经武王、成王二代,而成王时期的封建,以周公摄政为界限,可分前后两期。前期,伴随东征及其胜利,主要致力于东土、北土、西土,分封卫、鲁、齐、邾、郟、曹、滕、雍、原、燕、郟、聃、毛、毕、丰等国。后期,成王亲政后,继续加强北土、东土的控制,并大力经略南土,分封唐、邢、黎、韩、凡、蒋、茅、胙、祭,以及曾、鄂、厉、许、楚、邶、应等国,并徙封鄂等国。无论从数量、范围来看,还是从结构、性质而言,成王封建意义重大,是周王朝国祚绵长的重要基石。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,让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周初封建的丰富性,尤其是得以重新看到在周公高大光辉的形象遮蔽下,传世文献缺载的,成王后期封建的功绩。“成王靖四方”,应为史实,系成王历前后两期封建四土的结果。

注释:

[1]本文讨论的西周初期,始于武王克商,终于成王过世,历武、成二代。

[2]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:“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,故封建亲戚,以藩屏周。”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十五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9年,第3944页。

[3]《左传》定公四年:“昔武王克商,成王定之,选建明德,以藩屏周。”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五十四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4635页。

[4]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:“昔武王克殷,成王靖四方,康王息民,并建母弟,以藩屏周。”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五十二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4591页。

[5]《左传》昭公九年:“文武成康之建母弟,以藩屏周。”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四十五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4466页。

[6]《系年》:“周成王、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,乃追念夏商之亡由,旁设出宗子,以作周厚屏,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,以侯殷之余民。”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(贰)》,上海:中西书局,2011年,第144页。

[7]主要可分三说。1.武王说;2.成王说;3.调和说,认为周初有武王、成王的两次分封。后说又有不同观点:或认为武王封的是畿内诸侯,如太公望、周公旦等,而齐鲁等畿外侯则是成王所封;或认为武王所封若干诸侯在成王时期徙封;或认为,武王时期的分封只是袭夏商二代旧制,而成王时期的分封才是西周封建制的真正开始;或认为将其区别为“续生型”“创生型”封建。详参陈槃:《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250-251页;唐兰: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42-43页;任伟:《西周封国考疑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4年,第260页;晁福林:《试论西周分封制的若干问题》,《西周史论文集》,西安: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2年,第745-757页;尹盛平:《西周史征》,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年,第83-88页;刘光胜:“康丘之封”与西周封建方式的转进——以清华简《系年》为中心的考察,《史学月刊》2019年第2期。

[8]《封许之命》发表前,学者皆认为武王封许。参看何光岳:《许国的形成和迁徙》,《许昌师专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84年第1期;陈昌远:《许国始封地望及其迁徙的历史地理问题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93年第4期;徐少华:《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》,湖北:武汉大学出版社,1994年,第200页;金荣权:《周代淮河北上游诸侯国研究》,郑州:河南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107页。《封许之命》发表后,仍有学者坚持武王封许说,认为“周初武王封文叔于许一事,文献记载,向无二致,历来不存在任何疑义”。参见周书灿:《清华简〈封许之命〉“吕丁侯于许”新解》,《南都学坛》2020年第4期。

[9]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(伍)》,上海:中西书局,2017年,第119页。刘成群:《清华简〈封许之命〉“侯于许”初探》,《中原文化研究》2016年第5期。贾连翔:《〈封许之命〉缀补及相关问题探研》,《出土文献》2020年第3期。

[10]张珈铭认为这位“王”,有两种可能,一是成王,另一便是周公。张珈铭:《〈封许之命〉篇“命汝侯于许”疏解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23年第3期。

[11][83]李学勤:《青铜器麦尊与邢国初封》,《邢台历史文化论丛》,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0年,第98-105页。

[12][55][63]杜勇:《西周兴亡史》,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23年,第194-199,208-234,199-200,318-319页。

[13][27][95]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伍)》,第119、117、117页。

[14]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四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3770页。

- [15]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九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3854页。
- [16][17][72]徐元诰:《国语集解》修订本,北京:中华书局,2002年,第97、336-337、204页。
- [18][41][汉]班固:《汉书》卷二十八,北京: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560、1659页。
- [19]徐少华也持此说,并认为“许慎此说,显然是由于郟、甫(即吕)音近,而混淆了两者的关系”。徐少华:《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》,第200页。
- [20]《封许之命》发表前,学者多取许慎说,认为许即甫、吕。参见许同莘:《许国史地考证》,《东方杂志》1945年第41卷第18号;何光岳:《许国的形成和迁徙》,《许昌师专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84年第1期。
- [21][清]段玉裁:《说文解字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,第290-291页。
- [22][唐]孔颖达:《尚书正义》卷十九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526页。
- [23][汉]宋衷注,[清]秦嘉谟等辑:《世本八种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8年,第179页。
- [24][47][汉]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四,第127、133页。
- [25][宋]刘恕:《资治通鉴外纪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54页。
- [26]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(伍)》,第118页;贾连翔:《〈封许之命〉缀补及相关问题探研》,《出土文献》2020年第3期。本文引用出土文献,采用宽式,直接写通读后的释文。
- [28]贾连翔:《〈封许之命〉缀补及相关问题探研》,《出土文献》2020年第3期。
- [29]周书灿:《清华简〈封许之命〉“吕丁侯于许”新解》,《南都学坛》2020年第4期。
- [30]鹏宇:《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伍)〉零识》,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,<http://www.ctwx.tsinghua.edu.cn/publish/cetp/6831/2015/20150410081248634790207/20150410081248634790207.html>,2015年4月10日;王宁:《再说〈封许之命〉的“吕丁”与〈世俘〉的“吕他”》,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,<http://www.bsm.org.cn/?chujian/6407.html>,2015年5月21日。
- [31][唐]孔颖达:《尚书正义》卷十八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507页。
- [32][40][64]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四十五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4482、4482、4466页。
- [33][96][汉]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四十,第1692、1691-1692页。
- [34]值得注意的是,鲁、卫、晋、齐这些国君,皆始封君,且应系成王时分封,当然是事“成王”。太史公的这一修改,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。
- [35][42]黄怀信、张懋镕、田旭东: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修订本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416-420、518页。
- [36]杨宽:《西周史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100页。
- [37]鹏宇:《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伍)〉零识》,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,<http://www.ctwx.tsinghua.edu.cn/publish/cetp/6831/2015/20150410081248634790207/20150410081248634790207.html>,2015年4月10日。
- [38]王宁:《再说〈封许之命〉的“吕丁”与〈世俘〉的“吕他”》,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,<http://www.bsm.org.cn/?chujian/6407.html>,2015年5月21日。
- [39]《乐记》的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。参看李学勤:《郭店简与〈乐记〉》,《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——张岱年先生九十寿庆纪念论文集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22-28页。
- [43][62]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五十二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4601、4591页。
- [44]李学勤:《论周公庙“薄姑”腹甲卜辞》,《文博》2017年第2期。
- [45]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五十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4563页。
- [46][唐]孔颖达:《尚书正义》卷十七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484页。
- [48]唐兰: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》,第42-43页。
- [49][唐]孔颖达:《毛诗正义》卷二十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1328页。
- [50]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五十四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4635-4637页。
- [51]宋胡宏便据王称叔封为“朕其弟”,而认为《康诰》是武王时书。朱熹、蔡沈等人信从。近人陈梦家、童书业、屈万里等也赞同此说。屈万里认为:“今既知康叔初封于康,后徙封于卫,则封于康时自当在武庚之乱以前,亦即当武王之世。”详参赵伟丽:《〈尚书·康诰〉探研》,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09年,第5页。
- [52]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殷周金文集成》修订增补本,北京:中华书局,2007年;本文简称《集成》。吴镇烽: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》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、2016、2020年;本文简称《铭图》、《铭图》续、《铭图》三。以下不再一一注明。
- [53]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(貳)》,第144页。
- [54]李学勤:《由清华简〈系年〉重释沫司徒疑簋》,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》2013年第6期。

- [56] 杨筠如:《尚书核诂》,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1959年,第169页;赵光贤:《〈尚书·康诰〉篇首四十八字错简说考辨正误》,《文献》1991年第4期。
- [57] 刘光胜:《“康丘之封”与西周封建方式的转进——以清华简〈系年〉为中心的考察》,《史学月刊》2019年第2期。
- [58] “诞”系语气助词,“鄙”指划定边境。参见李学勤:《由清华简〈系年〉重释沫司徒疑簋》,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》2013年第6期。
- [59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:《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90年第1期。
- [60] [清]王先谦:《荀子集解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8年,第114页。
- [61] [汉]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十七,第801页。
- [62] 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四十一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4394页。
- [63] 《史记·晋世家》也记唐叔为成王弟,系成王封,但以桐叶封之则不可信。
- [64] 陈槃:《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》,第33-37页。
- [65] 两铭个别文字稍异,晋公盪绣损更多,此据晋公盪铭。
- [66] 李学勤:《晋公盪的几个问题》,《出土文献研究》第1辑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5年,第134-137页。
- [67] 《书·多方》:“王来自奄,至于宗周”,《书序》称:“成王归自奄,在宗周,诰庶邦,作《多方》”,记伐奄胜利后成王从奄回宗周。
- [68] 李学勤:《由清华简〈金縢〉看周初史事》,《中国经学》第8辑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1-6页。
- [69] 参见种建荣:《从出土甲骨文论周公庙遗址性质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(台湾)第356期,2012年11月。
- [70] [汉]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三十九,第1635页。
- [71] 宁镇疆、高晓军:《叔虞方鼎与西周初期的唐晋因革》,《历史研究》2023年第4期。
- [72] [清]郝懿行:《竹书纪年校证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10年,第3882页。
- [73] 此字有不同考释,或释觉、或释疏。参看李学勤:《释“疏”》,《考古》2009年第9期。
- [74] 朱凤瀚:《覲公簋与唐伯侯于晋》,《考古》2007年第3期。李学勤:《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》,《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》,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8年,第425-428页。彭裕商:《觉公簋年代管见》,《考古》2008年第10期。李伯谦:《覲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》,《中原文物》2009年第1期。
- [75] 李学勤:《文王玉环考》,《华学》第1辑,广州:中山大学出版社,1995年,第69-71页。陈剑:《释“琮”及相关诸字》,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》,北京:线装书局,2007年,第273-316页。
- [76] 邹衡:《论早期晋都》,《文物》1994年第1期。
- [77] [85] 李学勤、唐云明:《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》,《考古》1979年第1期。
- [78] 详参鹿小霞:《西周邢国二次迁封说辨析》,《文物春秋》2008年第2期。
- [79]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:《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》,《考古》1979年第1期。
- [80] 李学勤:《誓簋铭文考释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1年第1期。
- [81] 高智、张崇宁:《西伯既戡黎——西周黎侯铜器的出土与黎国墓地的确认》,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通讯》第34期,2007年9月。
- [82] 李学勤:《从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》,《出土文献》第1辑,上海:中西书局,2010年,第1-4页。陈颖飞:《清华简毕公高、毕桓与西周毕氏》,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》2012年第6期。
- [83] 李学勤:《曾侯朕编钟铭文前半释读》,《江汉考古》2014年第4期。
- [84] 郭长江、李晓杨、凡国栋、陈虎,湖北文物考古所:《编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》,《江汉考古》2019年第3期。
- [85] 郭长江、凡国栋、陈虎、李晓杨,湖北文物考古所:《曾公球编钟铭文初步释读》,《江汉考古》2020年第1期。
- [86] 李学勤:《疑尊、卣别解》,《饶宗颐国学院院刊》创刊号,2014年4月。
- [87] 李学勤:《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》,《楚文化研究论集》第2集,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1991年,第5-10页。
- [88] [98] 徐少华:《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》,第199、117页。
- [89] [唐]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十五,[清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3944页。

[责任编辑:陶婷婷]